



2018兩岸四地財經新聞及 企業傳播教育發展研討會

■為期兩日的「2018 年兩岸四地財經新聞及企業傳播教育發展研討會」場面鼎盛。(蘇學楠攝)



兩岸四地專家聚恒大 合議傳播教育發展

香港恒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與傳播學院於 11 月 2 日及 3 日聯合舉辦「2018 年兩岸四地財經新聞及企業傳播教育發展研討會」，旨在推動大中華地區新聞傳播教育的融合創新。本屆研討會邀請了超過 30 名來自兩岸四地的知名學者和業界菁英出席發表論文及評論，以及近百位嘉賓蒞臨指導。他們圍繞大會主題「數碼時代的傳媒變革及傳播教育」熱烈研討，吸引眾多師生參與，場面熱烈。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致開幕辭表示：「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把新聞最真實的一面呈現給讀者，新聞道德和專業素養是很大的課題」，希望研討會有助與會者理性思考新聞的社會責任和職業操守問題。

版面編輯、記者：鄭樂儀 李子和 張健兒

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致辭時表示：「科技發展非常迅速，傳播媒介和媒體機構的本質和運作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新聞傳播教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重要挑戰，應如何把革新的傳播科技融入傳統新聞教育之中，是我們新聞教育的重要議題。」

研討會共分為四個場次，論題分別為「新聞及傳播高等教育面對的新挑戰」、「後真相視角下的政治與新聞」、「大中華地區企業傳播的發展」及「媒體新商業模式與傳播科技」，共發表論文近 20 篇。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教授提出，有競爭力的媒體記者不但能編採、說寫、攝影，還要能上網，懂得視覺效果和語言表達，新聞專業人才訓練要打破傳統，進行全傳播技能的培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黃瑚教授則表示：「在新聞內容生產能力的培養方面，變與不變，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以事實為據。傳統的新聞教育，既有應該因時勢而變之處，也有應該堅守而不變之處。」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課程主任柳旭東副教授反思：「當記者們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是什麼因素支撐他們對於職業的堅持？新聞教育能夠對於這些因素有何貢獻？」

面對傳播科技變革帶來的新挑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蘇鑰機教授認為，以往的工作流程、發布平台和商業模式已經過時，新聞機構的應對策略「不是改良，而是改革」，但「信念和基礎不變」。

網絡技術對新聞傳播帶來革命性改變，亦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香港有線新聞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趙應春先生表示，近年香港出現很多公民記

者，但這個模式往往成為政治工具，造成社會無問對錯和真假；新聞從業者應堅守崗位，報道真相，「縱使被罵，那也已經是我們的價值」。在新聞傳播教育方面，新聞教育基金副主席陳淑薇女士強調，課程既要涵蓋傳統媒體，又要覆蓋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的運作。

院校交流助學生升學就業

曹虹表示，傳播學院多年來與兩岸四地的院校建立了良好關係，目前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她說：「這次研討會得到兩岸四地學者的大力支持，他們來自於內地的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及上海社科院；台灣的世新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學；澳門的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以及香港的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珠海學院，傳播學院甚為感謝。」

曹虹對進一步合作有明確想法：「傳播學院未來的合作計劃將分階段進行。除加強與現有夥伴的關係，學院計劃與更多知名院校展開交流，例如台灣的文藻外語大學、內地的清華大學；另外，學院正加緊與英、美及澳洲的大學洽談合作，首先考慮老師交流，之後透過國際化帶動更多同學走出去。」

曹虹還相信，傳播學院走向國際化會增加畢業生在升學、求職方面的優勢。她說：「很多大型機構、上市公司都重視畢業生有跨文化的求學經歷。事實上，豐富的履歷已經幫助我們的畢業生升讀本地及外國的研究院，走向更多知名學府。」

曹虹：傳播學院將加快國際化步伐



■曹虹表示傳播學院畢業生薪酬理想。(張健兒攝)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與兩岸四地多所知名院校已交流合作多年，「2018 年兩岸四地財經新聞及企業傳播教育發展研討會」於 11 月 2 日至 3 日圓滿舉行，令學院與姐妹院校的關係更加緊密。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傳訊及公共事務）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表示，未來各院校間的交流會越來越多，傳播學院將加快國際化步伐。

記者：鄭樂儀 李子和 張健兒

分階段推新課程

談及傳播學院的發展計劃，曹虹透露學院將配合大學的五年計劃，考慮增加新課程和新元素，擬設立有關廣告及媒體設計的學士學位課程，使課程結構更多元。

目前，傳播學院的「策略傳播文學碩士」課程已接受入讀申請，曹虹說：「傳播學院的碩士課程對畢業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她也提到，學院一直與業界緊密合作，增加了學生的實習機會和職位選擇，讓同學在不同領域均有發展機會。

收生方面，曹虹認為傳播學院過去幾年的收生成績不俗，加之優質的設備資源和小班教學優勢，學院課程對同學很有吸引力。

她說：「如果課程好、師資好，再加上業界和學生的口碑，以傳播學院現在的實力，我們不必為收生太擔心」。她強調，傳播學院會更致力優質教學培育專才學生，為專業及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僱主青睞懂商科的傳播學生

曹虹自信地說：「在全港七間有開辦新聞及傳播課程的大專院校裡，恒大傳播學院開設的課程是全港首個且為數不多包含商業元素的新聞傳播課程，這是我們的一大優勢。」她更強調，「我們的商科課程全部由商學院專科老師設計及教授，而商業新聞傳播課程的專業性亦受外界欣賞及支持，這令恒大傳播學院同學在商科方面具備扎實基礎，而畢業生深受僱主青睞。他們除了在各大媒體就業之外，很多亦在知名上市公司、企業機構、銀行及政府部門等工作，就業率非常高。」

曹虹還透露，很多僱主在聘請畢業生時會根據同學的課程背景提供不同薪酬，以新聞傳播為例，無論是傳媒還是上市公司等不同機構，「如果畢業學生有商業背景，加上有傳播專業，同學在薪酬上會較高，一般在港幣 14500 元或以上，而且將來升職加薪會較為有利。」

移動支付流行 長者應對難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8 年 3 月出版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4 號報告書》，2017 年約每兩名 65 歲及以上人士中便有一名擁有智能手機，與 2016 年約五名 65 歲及以上人士中只有兩名擁有智能手機相比，數字有所增長。隨著智能手機日益普及，愈來愈多香港人使用手機支付消費，但長者們是否有充分準備步入移動支付的世界？

記者：鄭樂儀 李子和 張健兒



■無人概念店並非完全沒有店員，在場有店員為顧客提供協助。（張健兒攝）

無人店少長者

位於西九龍的無人概念店今年 9 月開張，以移動支付招攬顧客。事實上，無人商店並非真的「無人」，店內外均有店員輔助顧客使用移動支付。

記者在店鋪外觀察 1 小時，期間僅有兩位長者進入店鋪，其中一位周太熟悉移動支付操作，她坦言剛使用時需要時間練習，「這些都是女兒教我，加上自己摸索，



■秀茂坪寶達市場，不少年長人士對電子支付的信心不大。（張健兒攝）



■秀茂坪寶達市場是香港首個以電子支付為特色的街市。（張健兒攝）

我雖老但腦袋還靈光！但電子支付真的好方便，現在出門都不多帶現金，八達通都少用許多！」習慣使用電子支付後，周太還開始向同齡朋友推薦使用。

不過，像周太那樣熟悉移動支付的長者還是少數。光顧荃灣某百貨公司的蕭婆婆表示，「我部電話很舊式，都不能下載，當然不懂得使用移動支付。始終用現金付款很方便，很難一時之間去改變用移動支付。」

本地某品牌連鎖零食店一直受長者歡迎，近年亦不斷推出各種優惠活動吸引顧客使用移動支付，但排隊交錢的周婆婆表示，「知道使用移動支付能夠節省金錢，但仍然未學懂如何使用。」

電子街市無拒現金

秀茂坪寶達市場在 2017 年開張，是香港首個以電子支付為主要付款方式的街市，亦是讓長者體驗移動支付的一個平台。記者看見街市內四處張貼著移動支付的標籤，但全部商店均接受現金和八達通支付。

記者在一家菜檔、雜貨店及麵包鋪外

分別停留 15 分鐘，統計超過 50 人的支付方式，當中約有 15 人為長者。在 50 位顧客中，只有 3 人使用移動支付，當中並沒有老人家，其餘則使用現金或八達通支付。

其中一位使用移動支付的家庭主婦黃小姐認為，「移動支付優惠多，是吸引其使用的主因，但不會因為這樣而減少使用現金和八達通。」

「（支付平台名稱）甚麼來的？」67 歲的張先生被問到是否有使用移動支付時說，「這些東西太複雜，又要綁定這個那個，豈不是比八達通更麻煩？不要說我六十幾歲，你去問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更不懂！」

對於移動支付連帶各種消費優惠，張先生回答道：「這些優惠對我們來說是很吸引，但每次要慢慢按，我們老人家手腳哪有這麼快，況且大家都是付款，現金、八達通一下子就好了。」

除了學習使用移動支付有困難，在街市買菜的陳太也擔心安全問題：「現在不是很多什麼黑客，那些黑客會不會入侵系統，騙走我的錢？」

手機購車票未成主流

密集的旺角地鐵站，記者發現使用移動支付售票機的乘客不多，但圍觀的人卻不少。

陳伯在葵涌某銀行內排隊等候處理個人理財，被問到是否使用過移動支付購買車票，他透露最近坐高鐵是在站內排隊買車票，「真不知道如何使用手機付錢，又不知道電子支付是

方保僑：要建立長者對移動支付的信心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表示：「智能手機出現大概十年左右，其實現今這群銀髮一族對電子支付的接受能力也算是頗高的。基本上他們都能夠使用智能手機，因為他們不希望外界認為老人家不會使用電子產品。例如八達通都是其中一種電子貨幣，很多公公婆婆都懂得使用及增值八達通，這證明了一般市民及長者對電子貨幣沒有什麼抗拒。」

但是，最大的困難往往是如何建立他們對移動支付程式的信賴和信心。方保僑說：「問題是他們用不用和是否信任這些電子支付，這是一個對電子支付的信心問題。」

他相信，在未來五至十年，老人家使用電子支付的情況亦會慢慢轉化：「社會始終會老化，即使有些一開始不使用電子支付的長者也會逐漸地使用。」

方保僑認為：「正正因為老年人對電子支付失去信心，因此需要更多誘因去促進他們使用電子支付。」

雖然商戶現時大多透過舉辦活動或提供優惠來推廣移動支付，但方保僑指出，現時的誘因不足以吸引長者使用移動支付，而且商戶在宣傳及推廣方面仍有不足。他認為，可以透過商戶、政府及其他機構「三管齊下」一起推廣，且相關機構可以為長者提供更多支援，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高科技社會。



■方保僑指未來五至十年老人家使用電子支付的趨勢會慢慢改變。（李子和攝）

否可靠，如果我不小心弄丟了手機，擔心被盜用電子支付內的金錢。」不過，有來自內地的朱婆婆表示：「移動支付在內地的交通工具十分常見，在深圳坐地鐵的人很多都已用移動支付取代車票，甚至老年人都懂得使用移動支付。」

紅十字會近年多次「血庫告急」，單在 2017 年 1 月至今，紅十字會網站上已出現 8 則有關血液存量短缺的新聞；相比 2015 年，僅出現 2 次。根據《香港 01》2018 年 7 月的報導，紅十字會輸血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醫生指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及癌症病患者數目增加，手術數目增加及趨複雜的因素都令到香港血液需求上升。但據紅十字會在 2018 年 2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2017 年的捐血人次由 2016 年的 328318 人減至 312972 人，下跌 4.7%。

記者：姚嘉琪 黎國榮

血庫常告急 市民捐血幾個「不」

雖然紅十字會一直有推出不同活動呼籲公眾捐血，如今年 4 月的「公務員捐血大行動」，又有全新應用程式「HK Blood」方便市民預約捐血，且據紅十字會回覆，下載次數已超過二萬次。但有市民反映，地點設置不便令捐血意慾減少。

地點、時間成阻礙

現時紅十字會在香港共有 11 個恆常捐血站，其中只有旺角捐血站在星期一至六的開放時間較長，由上午 11 時至晚上 9 時 30 分；而其他捐血站大部分開放時間都是由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或 8 時。上班族黎先生捐血逾十次，他說「捐血是市民的權利與義務」，但香港人普遍工時較長，放工時間大多為晚上 7 時至 9 時，即使想放工後捐血，到達時捐血站亦已關閉，令市民要用星期六日的休息時間捐血，導致捐血意慾大減。

除開放時間，地點亦是另一問題。黎先生指「很多時候都要花時間到另一區去捐血，自自然然都會覺得麻煩而放棄捐血」。現時捐血站未有覆蓋 18 區，不少市民要跨區捐血。黎先生住在深水埗區，最近的捐血站是旺角捐血站。他指雖然路程並不算遠，但也要花近半小時，「如果可以在各區多增設捐血站，一定能方便更多市民去捐血」。

其實紅十字會有提供流動捐血車服務，根據 2017 年的立法會議議記錄，現時只有 1 輛由 40 呎貨櫃車改裝而成的捐血車，多停泊於粉嶺區。黎先生認為，捐血車可以多停泊不同地方，或增加捐血車數量，方便市民捐血。

流動捐血不足

對此，紅十字會電郵回覆，「會按社會人口發展而去調整，增加捐血站或擴展相關捐血服務，明年亦會引入一輛全新流

動捐血車，加強與社會的接觸」。

根據紅十字會 2016/17 年報，流動捐血隊及校園捐血中心的收集量佔總收集量 21.8%，可見大專生是本地捐血主力。現時就讀大專院校的陳同學指在中學時，流動捐血隊會在上課時提供捐血服務，令學生不需要另花假日或放學時間去血站捐血，但升讀大專後反而減少捐血，「因為上課時間較中學彈性，而流動捐血隊到校園的服務時間較短，所以慢慢便沒有捐血」。以香港恒生大學為例，平均一年只有兩日有在校捐血服務，陳同學認為可以增加流動捐血隊數目、活動次數及服務時間，令同學的捐血意慾提升。

但紅十字會亦表示，發現近年主要暫緩捐血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為確保血液安全，如市民曾到訪潛在傳染病風險的國家或地區，都需要暫緩捐血最少 28 天。二是捐血人士血紅素不足，中心指過去兩年平均每年有約 40,000 名捐血人士因血紅素不足而須暫緩捐血，故此紅十字會建議「大眾要注意在日常生活補充鐵質」。

學校宣傳有限

不過，即使大學有捐血站亦不代表能吸引學生捐血。香港理工大學設有恆常捐血點，就讀該校護理系四年級的黃同學在 3 個月前才第一次捐血，不過當時只有兩三個人。她認為紅十字會浪費了這個優勢，「印象中學校沒有宣傳捐血，少見學校有橫額或者有人呼籲捐血，如果捐血中心外面有人駐足的話，才有姑娘問你想不想捐血」。

紅十字會回應，近年都積極向年青人呼籲捐血，如推出「給血聯盟 - 轉圈挑戰」、「千禧捐血新穎人」或「學生捐血獎勵計劃」等。自去年起更與不同學系學生接觸，如醫學系或設計系等，就學生所讀的科目展開合作計劃，讓年青人從不同層面參與捐血活動。

香港恆常捐血站



台捐血文化可借鑒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16 年的年報顯示，台灣捐血率為 7.53%，排名世界第一，其次是德國 5.73% 和丹麥 5.04%。在 2017 年，香港成功捐血人次逾 24.4 萬，佔人口約 3.28%。台灣則是逾 175.2 萬，佔人口約 7.43%，捐血率是香港的兩倍多。

總有捐血車在附近

台灣的捐血事務不是由紅十字會負責，而是由台灣血液基金會負責專職管理。台灣共有 5 個捐血中心負責該區域的捐血事宜，其中台北設有 1 個捐血中心，下設 23 個捐血站，而流動捐血車則在 26 個流動巡迴點輪流供人捐血。在台北讀大學的港人余小姐指捐血地方多又方便，「就好像港人熟悉的西門町，捐血車長期放在同

一個位置，讓人有空餘的時間便可捐血」。

捐血送自助餐 = 賣血？

在台灣捐血會有很多不同的禮物，就像捐血送自助餐券、火鍋券、抽獎送禮品。雖然有人認為這使捐血功利化，但台灣人廖小姐並不贊同這個說法，「聽說台灣在很早期的時候，需要輸血的病患還得花錢，之後很多團體才漸漸發起免費捐血活動。」

宣傳捐血在校園

學校方面，余小姐就讀的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會寄電郵告訴學生捐血日詳情，每三個月就可以捐血，校方會定期開放校園給捐血車進駐。余小姐表示，「我自己是在學校捐血，身邊很多同學都會一起相約去捐血，在學校捐血很多時候要排隊。」



■ 坐落在香港理工大學的紅十字會捐血站。(黎國榮攝)

香港性教育落後 指引21年未更新

今年8月底，關注愛滋病組織「關懷愛滋」公佈有關青少年性行為模式問卷調查結果。該組織在2013至2018年間，一共訪問3013位年齡介乎14-25歲的異性戀青少年，他們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17.8歲，當中只有29%的人使用安全套。根據衛生署提供的數字，香港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在過去5年呈上升趨勢，由2012年的513人上升到2017年的681人。有專家和教師認為，此現象反映本港性教育落後，政府應該就本地性教育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張天朗 丁梓維

■「德德」（左）和「家家」是家計會設計幫助家長進行性教育的教材。（網上圖片）

「關懷愛滋」在調查中發現，青少年沒有使用安全套的最大原因是「對方要求不用」、「不想破壞氣氛」，共佔三成。而在更早的調查中亦有類似情況，家計會《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的結果顯示，在12題有關成孕、性病及愛滋病感染的性知識題目中，中三至中六學生平均答對8題，比2011年的9題更低；而中一至中二學生則平均答對5題，較2011年的6題更低。

網絡資訊誤導

某中學廖老師透露，不少學校其實出現過學生因發生不安全性行為而懷孕的個案。她表示，這些個案發生的原因第一是對性好奇，青少年生理發育令他們對性行為躍躍欲試；第二是尋求自我認同，他們「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美麗，不夠好，覺得進行性行為可以令自己增值、感覺被重視」；第三是傳媒資訊誤導。

廖老師表示，根本原因是青少年缺乏了解正確性知識的渠道，最後導致不安全性活動，例如有年輕人誤信網上評論進食個別水果可避孕，結果懷孕。於城大就讀的Chloe一向有使用網上討論區的習慣，「經常會看見很多帖子談及性話題」。她明白討論區上的資訊未必絕對正確，但大部分性知識都來自互聯網。她說，「其實只有很少渠道給我們（青少年）接觸相關知識，學校又沒有教這些（正確性知識），好多時也是網上自己看。」對於網上性愛影片，她大方表示有接觸，亦是抱著好奇心才觀看。

學校性教育過時

廖老師坦言香港現時的性教育過時，「如果是跟著政府的指引，例如每年辦一兩次講座，或在班主任課時由班主任講解，這樣做的成效不高。」但她表示始終是政府發出的官方指引，「outdated（過時）怎樣也比out syllabus（過界）好，雖然outdated（過時），但有甚麼學校敢越界去教一些正確但不教學大綱裡的知識呢？」

另一方面，廖老師還擔心如果學校主動提供性教育，可能還要承受來自家長的壓力，「家長會覺得，不是吧，你教我的子女這些（性知識），那就是叫他們去做（性行為）」。她指現時的教育指引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比較單一，具體教學只能靠老師個人經驗處理。

今年1月9日，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發表了一份有關性教育的

資料摘要。

報告指出超過七成五的受訪學校認為提供性教育的主要障礙是政府並無制訂相關政策，亦有七成四的受訪學校認為教師未有足夠準備以及缺乏教學資源進行愛滋病預防或性教育。

官方指引1997年修訂

「關懷愛滋」的助理項目經理鍾詩韻指，現時香港性教育處於停頓的狀態，她認為教育局供學校參考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具有全面的內容，能在不同方面指導學校，但在執行上缺乏監察，而且指引亦沒有規定學校必須跟從。「無論學校辦多少次（講座），辦不辦，找甚麼人，其實學校都有彈性處理。」但鍾詩韻提到的《學校性教育指引》，最新一次更新時間是1997年。

鍾詩韻補充，現時有很多性教育的方式是「恐嚇式性教育」，利用一些負面資訊，例如以真實的墮胎片段，或展示性病的圖片來宣傳安全性行為。「你不要做愛，不然的話你就會有BB，如果要墮胎的話你就是破壞生命」，她認為性教育應包括這些部份，但並不全面，更不應該過份負面，反而需要正面地教育。

專家：性教育可獨立成科

鍾詩韻坦言，在香港要把性教育獨立成科具一定困難，但仍希望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經驗，將性教育獨立成科，並且規限時數及統一內容。她建議性教育可以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要從知識層面開始，再擴展至生活技能，最後到價值觀教育。

她又指，「關於性的問題並不是你給他們（青少年）一個安全套就能解決，因為性教育的層面不僅涉及基本的性知識，例如認識安全套、性病、性健康、避孕等，更多的是性背後所引伸的一連串問題，如性同意、如何溝通、性別平等。」

鍾詩韻還說，現時在中學推廣性教育有一定的阻力，「我們曾經向四百多間中學免費推供課程，最終只有一間願意接受。」她認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在現時的教育制度下，大家都著重學業成績，學校未必能提供額外的時間讓學生接受足夠的性教育。除了學校時間不足外，她認為，教師亦要接受相關的教育，並定時檢視性教育的內容以適應現實需要。

■「關懷愛滋」助理項目經理鍾詩韻表示，性教育可獨立成科。（受訪者提供）



■蔡同學欠逾萬元「卡數」
(金偉諾攝)

欠過萬卡數 大專生「碌卡」陷財困

掌管全港 500 多萬消費者信貸紀錄的個人信貸資料庫機構環聯早前公佈，截至 2017 年末，持有信用卡的「95 後」較 2016 年初增長 1.34 倍，增加近 14.2 萬人，總持卡量亦由 10.2 萬張，大幅增至近 26 萬張；拖欠卡數人數亦由約 1200 人增加 1.3 倍至約 2800 人。越來越多以大專生為對象的信用卡計劃出現，加上網上及手機支付當道，大專生申請信用卡絕非難事，但結果是「先使未來錢」的機會大增。有同學表示因過度消費，引致龐大財務壓力。

記者：金偉諾 鍾鎮洪

記者曾用網上問卷訪問逾 50 位 18 歲至 24 歲大專生，近四成 (38%) 大專生擁有 2 至 3 張信用卡，超過五成學生 (59.1%) 曾欠卡數逾 1000 元，原因大多用作旅行經費。近七成學生 (69.2%) 為求方便申請信用卡，其次是折扣優惠，達四成三，亦有超過三成受訪者因贈品而申請。

大專生申請手續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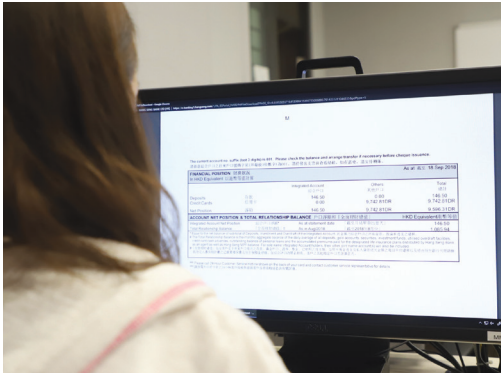
向本地銀行查詢所得，若申請人是全日制大專生，便可以豁免入息審查，只需提供學生證即可，年費亦無須繳付，且信用卡公司會以禮券、行李箱等作贈品，吸引學生紛紛申請信用卡。部分本地銀行更會以現金回贈及飛行哩數作招徠，對大專生來說，無疑具吸引力。

相反，在職人士要申請一張信用卡有一定的門檻，而且過程相當繁複，除了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住址證明，亦要出示入息證明文件。之後，發卡公司會對申請者作入息審查，再決定是否接受申請，過程費時之餘，有時候信用卡公司甚至會因應申請者的財政狀況而拒絕申請。

不自量力欠卡數

黃同學就讀香港教育大學三年級，他指平均每星期會使用信用卡消費 1 至 2 次，曾最高拖欠信用卡數目達 8000 元。他指那次是因為「即興」去旅行，「碌卡」花了逾 6000 元，加上其他消費近 2000 元。

他表示當收到賬單時，對數目並不意外，「當時心裡面已知大概數目，但仍覺得可以慢慢償還」，但臨近還款期限時發現自己連最低還款額都無力償還，於是向家人坦白。家人不想銀行賺利息，為免夜長夢多，最終幫他將卡數「一筆清」。自此黃同學不敢亂用信用卡付費，「有現金時就用現金付錢」。



■蔡同學表示收到銀行賬單後因難以償還感到迷惘。(金偉諾攝)

黃同學承認自己無儲蓄習慣，銀行戶口最低時只得幾毫。但他不擔心財政問題，「屋企每星期都會給 500 元零用錢」以維持生活。

欠下大筆卡數不僅是黃同學一人，香港恒生大學二年級的蔡同學現時需要償還 1 萬多元的卡數。她表示每月只能還近 400 元的最低還款額，而且家人全不知情。蔡同學指自己在購買化妝品、出席朋友聚會、乘 Uber 等活動經常「碌卡」，以致有過萬元的債務。

蔡同學現時並無兼職，只靠之前儲蓄和家人給予不少過 500 元的零用錢作還債，感到吃力。

手持 2 張信用卡的她平均一星期透過信用卡消費約 1000 元。她被問到當初為何要申請 2 張信用卡，她認為信用卡消費帶來便利，其次覺得擁有信用卡是「大學生象徵」。

她坦言：「經此一役，覺得申請一張卡便足夠，要還 1 萬元不容易，自己既無兼職，又無儲蓄，還相當困難。」蔡同學認為自己並無儲蓄習慣源於以前太依賴家人，「以前我用了多少錢就可以問家人要，所以不用儲錢。」

未雨綢繆 避免負債

剛剛大學畢業的 Heidi 仍在待業，以不斷做兼職維持生活。22 歲的 Heidi 每月會儲蓄近 2000 元，最高峰時銀行存款達 7 萬元，她表示從未拖欠卡數，又指自己是個隨心消費的人，但從未感覺有財政壓力，原因是她會預計將來的花費。

她說，「例如我這個月賺多少，自己心裡有數，亦清楚自己大概花費了多少。若我今個月超出預算，下個月會節制。」

投資者教育中心向大專生提出改善財政狀況的建議，例如大專生應養成每日記帳的習慣，把支出分類入帳，掌握

自己的消費模式，亦要按照預算行事，配合記帳並檢討進度。另外，大專生應了解自己需要，避免衝動購物，消費時善用學生優惠，享受優惠價格以節省支出。除了節流之外，開源亦是不二法門，故中心建議大專生在不影響學業前提下，在假期兼職工作增加收入。

旅遊是不少大學生花錢最多的項目，往往旅行完結後，便要重頭開始儲蓄。Heidi 自有一套方法應對，「每次旅行前都會努力工作，將工資用作旅費，做到儲蓄收支平衡」，她還說：「在這個年紀的確很難儲錢，但我一定要確保自己不會超支」。

大專生與在職人士 申請信用卡條件比較

大專生	在職青年
●無入息要求 ●學生證和身份證	●設有最低年薪要求 ●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地址證明 ●入息證明



專家：要分辨必需品與娛樂消費品

大專生「欠卡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客座副教授吳明德指，大學生未投身社會工作，日常收入主要來自零用錢、政府資助及兼職，但信用卡為他們提供額外消費額，對大專生而言，無疑是種誘惑。他提醒學生，「消費時要自制，應考慮自身的需要與財政狀況，不應盲目追求名牌」他還說：「使用信用卡要量入為出，根據自己的財務狀況作調節，信用卡也可以是讓大專生培養良好理財習慣的

工具。」

另外，他指在理財上，支出可分為必需品、投資、娛樂消費品及保障類四大部分，大專生現階段未需投資，加上經驗尚淺、資金不多，所以不應在這時候急於投資；加上他們亦無家庭經濟負擔，不需購買保險。他認為，大專生現階段只需花費在必需品及娛樂消費品上，因此學習理財應從瞭解自己的消費需要入手，學會分辨必需品和娛樂消費品，控制非必要開支。



■吳明德指求學階段應了解自己的消費需要。(受訪者提供)

奪金港欖發展受限



■門牛是欖球比賽中很常見的一種競技模式。(受訪者提供)

香港男子七人欖球代表隊（下稱港欖隊）在 2018 年 9 月的雅加達亞洲運動會（下稱亞運）中，以 14：0「零封」宿敵日本隊，奪得第一面亞運金牌。港欖隊過往幾年成績斐然，球隊亦得到不少贊助，但欖球在香港的發展並不如外表光鮮，場地稀缺和人才斷層一直是困擾港欖隊的難題。

記者：王惠雲 郭思衡

「精英項目」不愁資助

憑着卓越的成績，男子七人欖球於 2010 年被香港體育學院選入「精英訓練資助項目」，並於 2013 年成為香港體育學院「A 級」支援精英體育項目。受訪者楊嘉輝，曾是賽艇港隊隊員，亦參與欖球運動 4 年。賽艇與七人欖球同樣是「精英項目」，他了解體育界的運作，明白成績等於一切的道理。他說：「如果沒有成績，就不能入選精英項目，當不能入選精英項目，便沒有資源。香港賽艇和欖球長期保持在亞洲首數名，所以能長期居於精英項目。」

作為精英項目，港欖隊一直受到政府與各界的資助。根據香港欖球總會 2017 至 2018 年經康文署審計的報告顯示，康文署及各界資助香港欖球總會的現金補助金總金額近 1,380 萬元，而且金額足夠應付所需開支，還餘下近 270 萬元。

華利欖球會球員及香港欖球總會旗下教練莊志堅認為：「在香港，現在的發展算是不錯。因為香港有很多大型的機構資助欖球，例如瑞銀集團、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無論是大專級別，或是不同球會及香港欖球代表隊均有大型機構支持。

莊志堅教練還說：「以前香港沒有很多渠道參加這項運動，現今比以前有很大進步。而且香港欖球總會也會舉辦學界及大專界的比賽，令學生有更多不同渠道參與賽事。」

場地長期受限

雖然香港欖球資金充足，但場地是一個重要的限制因素。由於欖球和足球同樣衍生於傳統足球，兩者場地大小相約，但欖球比籃球和足球有更多身體碰撞，所以欖球只能在草地球場上進行。香港能夠進行欖球活動的天然草場及人造草場只有 14 個，但能夠進行足球運動的天然草場及人造草場則多達 45 個，是欖球場地的三倍多，還沒計算私人草場。

這 14 個欖球場地集中在九龍及港島區，當中 11 個屬於多用途草場，使用者不只是香港欖球會，還有足球及美式足球隊伍。也就是說，香港欖球會需要與香港的足球及美式足球隊競爭場地的使用權。香港暫時只有 3 個專門打欖球的場地，分別是跑馬地遊樂場、天水圍天業路公園及大坑東遊樂場。

華利欖球會教練及前日本職業欖球聯賽球員巫卓軒先生投身欖球 12 年，曾代表日本職業聯賽隊伍（鬆下電機狂暴武士）出賽。他認為，對比外國，香港在欖球上發展最大的難題是場地問題，認為香港欖球場地供不應求。他說：「打欖球的人越來越多，但場地越來越少。」他以前主要訓練大學生及香港欖球總會會員，而現在多了許多中、小學生參與，但場地一直是訓練上的難題。

收入不穩 轉工難過錢關

值得關注的是，香港欖球員收入不穩定，

欖球不等於美式足球



欖球和美式足球經常被混為一談，很多人以為欖球就是美式足球的別名，但其實兩者在人數、裝備上都很不同。

欖球		美式足球
分 7 人及 15 人制	人數	11 人制
軟式護具及牙膠	裝備	頭盔、護肩、護頸等
形狀較大，接近橢圓	球	形狀較小，兩端較尖
100 米長、70 米闊	場地	109.7 米長、48.8 米闊
7 人制：上、下半場各 7 分鐘 15 人制：上、下半場各 40 分鐘	比賽時間	4 節，每節 15 分鐘
達陣得 5 分 達陣後必須把球觸碰著地	得分	達陣得 6 分 達陣後不可把球觸碰著地



僅靠球會收入難以應付日常開支。據香港欖球總會 2017 至 2018 年經康文署審計的報告顯示，教練時薪約為 200 至 400 元，收入來源主要集中在每年 8 至 12 月。雖然時薪不俗又有香港欖球總會培訓，但由於他們每年僅 5 個月有收入且球員福利基本只包醫療，確是容易令人卻步。

巫教練認為，雖然越來越多小朋友參加欖球的暑期班，但香港運動員沒有穩定收入令家長拒絕讓小朋友投身體育，因為他們認為體育沒有前途和「錢」途。

香港大專欖球隊隊長李煦漢表示，朋友知道他打欖球後，擔心他會受傷，因為朋友對欖球的認識不多，認為是欖球衝撞性較大及容易受傷的運動。

因此，打欖球的人比做其他運動的人少，校隊隊員主要是那些從小接觸欖球的人，新入隊的比例很少。

但莊志堅教練則認為，他沒有想過發展成為職業欖球員，因為香港除了香港七人欖球代表隊，根本沒有職業欖球員。他說：「想成為職業欖球員，只能到日本歐洲或紐西蘭。」

大坑舞火龍：鬧市中保留百年傳奇

大坑舞火龍當晚花燈巡行。（許麗怡攝）



■舞龍健兒在安庶庇街插香起龍。（受訪者葉同學提供）



每年中秋節晚上，一條巨型火龍會在銅鑼灣的大街小巷穿梭，為這個繁華鬧市增色不少。舞火龍傳統有着逾 139 年歷史，頗具香港文化特色，在 2011 年被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無論你是香港人，還是遊客，都不容錯過。

記者：許麗怡 何慧盈

源於驅瘟疫

位於銅鑼灣以南、掃桿埔以北的大坑原是人口稀少的客家農村，村民主要以耕種、打魚、種菜、養豬及打石為生。相傳於 1880 年中秋節前夕，颱風吹襲大坑村，一條大蟒蛇吞食村裏的家畜，村民合力把牠打死，並送往銅鑼灣差館。第二天早上，村民發現原本放在鑼內的大蛇屍體不翼而飛，接着，大坑村便發生瘟疫，導致很多青少年死亡，村民十分害怕。

當時一名村中父老獲菩薩報夢，提示如果在中秋佳節舞火龍繞村遊行並燃燒炮竹，可驅瘟疫。於是，村民便在中秋節晚上在火龍上插滿長壽香並燃燒炮竹穿過大街小巷，而村內果然平安大吉。原來炮竹內含琉璃白藥，加上香火便具有驅除瘟疫的功效。此後，村民開始每年紮製火龍，在迎月、追月、賞月三天晚上，即農曆八月十四、十五及十六日巡行全村，至今已有 139 年歷史。

火龍製作繁複

火龍製作考究，龍身長全 67 公尺，共分為 32 節。火龍的結構分為龍珠、龍頭、龍身和龍尾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龍的眼珠，俗稱

「龍珠」，用兩個插滿線香的沙田柚製成。龍頭由藤條彎曲製成骨架，以鋸齒狀鐵片製成龍牙，手電筒製成雙眼，舌頭則是漆紅的木片。龍身則以一條粗麻繩紮成，再用稻草（現改用珍珠草）包裹，最後龍尾則以藤架製成。

「成龍」與「歸天」

大坑舞火龍是每年中秋的盛事，農曆八月十四日晚上 6 時左右，火龍會於大坑蓮花宮點睛「開光」，經過「開光」儀式，草龍才能變成真龍。舞龍健兒通常在安庶庇街插香起龍，首先到浣紗街向嘉賓作敬禮，再按傳統在徑京街、新村街、銅鑼灣道等舞動。

舞火龍儀式分為「火龍過橋」、「火龍纏雙柱」及「綵燈火龍結團圓」三個部分。村民亦會製作放有魷魚花生的「龍粥」供全村人享用，場面十分熱鬧。

火龍隊第一晚會入廟，頭三晚舞龍健兒會順時針舞火龍，直到八月十六日晚上 10 時 15 分左右，再以逆時針方式走一圈，俗稱「行大運」。最後，舞龍健兒高舉火龍自電車路行至銅鑼灣避風塘一帶，巡遊完結後將火龍掉往大海，俗稱「龍歸天」。

現今舞火龍安全環保

有 139 年歷史的舞火龍亦經歷了時代變遷，今天的舞火龍更加安全環保。往年參與舞龍的村民被稱為「舞龍壯士」，現在改稱為「舞龍健兒」。昔日舞火龍巡遊時，街道並沒有鐵欄包圍，但蘭桂坊人踩人事件後，鐵欄在活動期間會包圍巡遊街道。舊時盛行「搶龍鬚」，

因為整條龍鬚有定驚辟邪的功效。但現在為免場面混亂，已改為預早登記領取龍鬚，有登記就獲分派。過去，活動完畢後，健兒會把火龍拋向銅鑼灣避風塘海底，以示「龍歸天」；但近年為免污染海水，便改為在深夜用貨車把火龍送到焚化爐焚燒，雅稱「飛龍在天」。

過火龍為生「龍仔」

「在舞火龍初期，當時環景不佳，經費不足，服飾裝備沒有現今的齊全，所有舞龍健兒只穿背心舞火龍。怎料一個不留神，有炮竹從腋窩彈向舞龍健兒的身體，場面極為驚險。」

輝哥亦笑稱，「試過有一年，有孕婦連生幾胎都是女兒，丈夫便帶着身懷六甲的她在支竹的距離『穿龍身』，希望誕下『龍仔』。」

■大坑舞火龍法定承傳人和總指揮陳德輝對舞火龍很有感情。（何慧盈攝）



■舞龍健兒用珍珠草包裹龍身。（許麗怡攝）

陳德輝先生，人稱「輝哥」，是大坑舞火龍法定承傳人和總指揮，從小便參與舞火龍這個傳統活動。擁有數十年舞火龍經驗的他分享了許多趣事。

外國人擔龍心組組長

以往大坑舞火龍只准當地居民參與，近年開始放寬，只要外來人士出示大坑地址亦可申請舞火龍，故此越來越多外來人士借用大坑居民地址申請。

但是，傳統上只有男士可以舞龍，女士只可參與紗燈、蓮花燈和音樂等部分。輝哥之所以一直堅持，也是想要保留這個傳統，輝哥又說，「除了年輕人，近年有更多居住在大坑的外國人參與，甚至今年有外國人擔任龍心組組長」。他指該名組長非常熱衷於活動，已參與 7、8 年，可見這一傳統活動亦受到外國人關注。

年輕人不容錯過

已參與大坑舞火龍數年的葉同學是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2 年級生。每逢中秋節，他都回大坑到祖父家吃團圓飯，然後上街觀賞舞火龍，這已變成了他每年中秋節的保留節目。

葉同學說，「我認為年輕人應該會對傳統舞火龍感興趣，因為這項活動具備了耀目、刺激和型格等元素。且年輕人熱衷刺激性的表演，若然曾經到現場觀看過大坑舞火龍，便會知道它的振撼。因為龍身插滿長壽香，當舞者揮動龍身時會有危險，但拍照效果很美，現時年輕人都愛拍照打卡，打卡機會難得。」葉同學還說，「舞火龍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傳統文化，每年吸引大批市民和遊客慕名而來，亦吸引不少外國傳媒採訪，作為一個表演者和半個大坑原居民，他感到自豪和驕傲，希望這個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港非主流音樂步履維艱



■ The Bakerie 樂隊表演受樂迷追捧。
(bakerie 官方 instagram)



■獨立樂隊「鐵樹蘭」的錄音器材。(黃俊安攝)

音樂真人秀帶「小眾」走進主流

今年2月，有「非主流音樂界紅館」之稱的 Hidden Agenda 創辦團隊宣布，在結業11個月後，重開名為 This Town Needs 的音樂表演新場地。2017年，Hidden Agenda 在四次搬遷後仍不敵法例監管，於當年3月被迫結業。失去了主要表演場地，香港非主流音樂似乎進入了黑暗時期。雖然面對重重困難且前路依舊充滿制肘，但許多本地獨立創作人認為：「只要音樂尚存，仍然有希望。」

記者：黃俊安 高躍曦 陳翠敏



■ The Low Mays 與樂迷合影。(黃俊安攝)

展演欠空間

非主流音樂，或稱小眾音樂，坊間以此描述有別於主流商業唱片廠牌製作的音樂，其製作過程獨立自主，從錄音到出版都由音樂家獨力完成。不過，這種音樂在香港舉步維艱，可供非主流音樂人使用的場地屈指可數。

根據食環署資料，2017年香港共有209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包括戲院、大型展覽場館及遊樂場等，其中遊樂場及大型展覽場地佔116個，適合非主流音樂表演並擁有娛樂場所牌照的場地很少。目前，能為音樂人提供現場展演空間（Live House）的只有 HMV Live House、MOM Live House 等幾個小型場地。

欠缺展演空間，獨立樂隊運作經費有限，未獲許可的「地下場地」因此大受歡迎，飽受爭議最後被迫結業的 Hidden Agenda 便是最知名的一個。據了解，這些表演場地通常位於租金較低的工廈，但依據地政總署早年簽訂的地契，工廈不能作工業或貨倉以外的用途。因此，為非主流音樂提供展演場地的組織在高昂的租

金面前，往往選擇以「違例」的方式破局。

支持不足誤解深

「地下音樂的前路依然是未知之數」，香港 Hip Hop 組合「The Low Mays」成員健康華認為，華語圈開始流行街舞、說唱等嘻哈文化，是透過受眾較多的網絡電視進行推廣，確實令非主流音樂慢慢走進香港人的視線。但他又指，當《中國有嘻哈》掀起華語說唱新一頁，「就被封殺，打回原形」。今年1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提出「四個絕對不用」標準，對廣播電視節目邀請的嘉賓作出限制。其後多間內地傳媒指出，廣播電視節目「禁止邀請紋身藝人、體現嘻哈文化、非主流文化（次文化）和頹廢文化的藝人」。

在香港，雖然非主流音樂沒有被明確打壓，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目錄顯示，受資助項目不包括非主流音樂，得到資助的都是古典音樂、國樂和歌劇。健康華亦表示，本地人對音樂的理解只流於消費層面，他感慨香港人只是

將音樂視作娛樂，未能融入生活。

團結、堅持才有希望

獨立唱作人 Brian Tsang 表示，香港非主流音樂是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加上製作音樂的器材較過去便宜，參與音樂創作的門檻較低。「The Low Mays」的另一成員馬太福音則認為，網絡有助非主流音樂傳播，「最初非主流音樂給人地下、邊緣的感覺，隨著近年與主流樂壇的合作漸多，公眾的觀念也開始改變，所以我對未來發展，也有少少信心」。

「相比一個展演場地的存亡，將香港的獨立音樂人團結起來，健康發展才是最重要。」樂迷 Grace Wong 參與過近百次地下音樂演唱會，他認為：「要改善 Live House 的經營苦況，還是要從非主流音樂走出去開始。正如 Sean Miyashiro 所言，非主流音樂就是對主流的不滿足，就是挑戰主流，嘗試改變人們的聆聽習慣。非主流音樂應該要繼續做下去，不管路有多長。」

香港近年有獨立樂團舉辦過大大小小不同的音樂會，例如「秋紅」、「逆流」，令非主流音樂開始走進主流大眾的視線。其中本地非主流樂團「雞蛋蒸肉餅」更加在2017年獲得台灣金音創作獎的海外創作獎，並獲邀到世界各地的音樂節表演，將香港的本地非主流音樂作品帶上國際舞台。

藉着亞洲音樂真人秀的強勁人氣，香港非主流音樂開始培育出一批本地說唱樂隊，當中名氣較大的有「The Bakerie」、「The Low Mays」等，他們在 youtube 的音樂影片有大批樂迷，部分影片點擊人次更高達90萬。以「The Bakerie」的作品《早班火車》為例，有網民留言「堅持、達到、夢想」，「想不到會這樣好聽」和「我台灣人，這首好感人，不懂廣東話大概懂意思，都被感動到」等。而且，「The Bakerie」的成員 Doughboy 亦是音樂真人秀《中國有嘻哈》的製作人之一，這令更多中國樂迷認識到他的團隊，他們的新專輯「老佛爺」在2018年更展開全國巡演。在本地，非主流樂隊亦得到越來越多樂迷支持，「The Low Mays」的香港演唱會還特別加開場次。

但很多非主流音樂人表示，不希望以「地下」標籤他們，因為不少香港「小眾音樂」在國際音樂界其實也是主流，只是未能在香港遇上知音而已。

傳新報編輯委員會名單

執行編輯：金偉諾 黃俊安 版面編輯、記者：陳翠敏 陳惠婷 鄭樂儀 張天朗 張婉儀 鍾鎮洪 何慧盈 許麗怡 姚嘉琪 金偉諾 高躍曦
郭思衡 黎國榮 李佩芝 李子和 吳焯庭 丁梓維 張健兒 溫耀麟 黃俊安 王惠雲